

沈从文

全集

篆刻卷

西泠印社 出版社

沈从文

全集

篆刻卷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沙孟海全集. 4 / 朱关田总编. — 杭州 :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35-862-6

I. ①沙… II. ①朱…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289号

《沙孟海全集》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家扬 王耀亭 毛昭晰 孙家贤

主任 陈敏尔 黄坤明 茅临生

副主任 吴天行 林晓峰 钱巨炎 寿永年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江 吟 陈 浩 沈祖安 柳国平

高克明 郭仲选 蒋建东 傅通先

鲍贤伦 薛维海

《沙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 编 朱关田

副总编 沙茂世 沙更世 李立中 赵雁君

学术指导（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冬龄 王伯敏 方传鑫 石兴邦

刘 江 李文采 汪济英 杨永龙

邱振中 陈振濂 金鉴才 祝遂之

章祖安 曹锦炎 韩天衡 蒋北耿

鲍士杰 戴小京

委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小红 方爱龙 朱关田 李立中

沙更世 沙茂世 汪济英 张忠良

陈根民 陈翌伟 胡小罕 洪廷彦

赵雁君 桑 椹 鲍复兴 戴家妙

篆刻卷

顾问 刘江

祝遂之

主编 戴家妙

总序 / 朱关田

沙孟海为中国现代书坛巨擘，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尤其在书学、印学两大领域，于创作与研究两端取得非凡成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标志性人物。

沙孟海（一九〇〇—一九九二），原名文瀚，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别号僧孚、沙邨、兰沙、决明、石荒，中年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五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幼承庭训，喜好书法与篆刻。早年肄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宁波），从冯君木学诗、古文辞，从钱太希、赵叔孺习书法、篆刻。一九二二年冬游学沪上后，从游吴昌硕，又谒访康有为、郑孝胥、罗振常等名流，同时自学文字学、金石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见闻益广。曾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一九六三年起被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聘为书法、篆刻教授，一九七九年起担任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一九七九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逝世于杭州。

沙孟海作为书法家，一生亲历民国以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发展的风云际会，展开了以学术涵养创作的人生道路。

沙孟海接受教育与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形态、文化体制和学术思想等发生巨大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终结，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一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沙孟海虽潜心学术、艺术，但近代学术的思想变迁和书学领域的碑帖交互，对他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中年时期，沙孟海身处多艰时局，为生计所困逼，一度于学术稍加疏远，但他在前辈遗老纷纷凋零的境况下，又得以与马一浮、沈尹默、张宗祥、顾颉刚等新辈名宿同学论艺，颇意书法篆刻史论研究与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其更为明确。晚年的沙孟海，排除困难，在文物考古，尤其书法篆刻研究和创作、高校书法教学诸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八十岁以

后，沙孟海躬逢国家改革开放之盛世，艺术之树，老枝新开，推扬国粹，倾心艺事，且完善自我，奖掖后进，业绩卓然，斯有目共睹，或以为有超迈前辈处。

回顾沙孟海一生艺文行藏，其转益多师，穷源竟流；与世推移，技道并进；谦退冲虚，不卑不亢；抗志希古，壮心不已，是在多方面尤其书法、篆刻之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且丰富的精神财富。有关这方面，可以参阅收入《书学卷》的几篇文章，如《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九十述怀》、《书学师承交游姓氏》等。兹举沙孟海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病中所作的《与刘江书》为例。这封书信，本为针对如何培养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的五位研究生而发，但其中提到的『主要应抓小篆……必须加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对正楷功夫应加重重视……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学问是终身之事』、『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等几点意见，指出了书法技能学习、学术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关键问题，对当今书法界仍具深刻的借鉴意义。

沙孟海晚年以书坛领袖闻名海内外，但其一生成就实在是多方面的。当其本色，是书家，更是学者。书学、印学而外，古典辞章、文字训诂、金石碑版、文物考古，无不精通。全集聚珍，自可解释。

沙孟海书法，诸体兼擅。早年习书，从篆书入手，下逮汉魏碑版、晋唐法帖，恣意规模，领略体势。中年以后，多作真、行、草书，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以外，于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黄道周等用功较深，探综众长，融会贯通，行以己意。晚年书法，错综变化，益见精善，沉雄茂密，自成格局。尤喜作题榜大字，深为世人所推崇。

沙孟海篆刻，浑穆高古。初摹秦汉，谨严规矩。嗣后出入赵叔孺、吴昌硕之间，得『太阴』、『太阳』之助，又汲取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和浙派诸贤之长，加上旁涉古文字，大凡篆籀、陶铭包括古器物，加减乘除，去故纳新，终于为我所用，独出机杼。而其既篆又铭，亦印亦书，异质同调者，最为难得。印章边款出类拔萃，亦差可出人头地。

沙孟海的学术成就，是以扎实精进的文学训诂之学和文史兼备的辞章功夫为基调，加之不断关注考古新材料、学术新进展，围绕书学、印学两个中心点而展开，此尤难能可贵。早年有关书法篆刻的论述，已能关注艺术的时代演进与学术的系统化梳理，多有见地，如撰述于一九二八年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两文，均掲載于一九三〇年上海《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是中国现代率先问世的较有系统的书法、篆刻史论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中晚年的论著，更能利用考古新材料，注重考证与精审，以

严谨的治学方法研究书法与篆刻，时见发明，道先人之不能道，成一家之言。

沙孟海作为学者、书法家，深谙『技』、『道』之理。技之在用，实为手段；道之在体，是为目的。一末一本，并进齐修，方能不堕虚空，不失之根本。沙孟海学问、艺术，固然平实敦厚，不蹈依傍，而实归之法古出新，今不乖时，又能用志不分，自胜为强。其独秀独出，盖不虚誉也。

沙孟海著作已见行世者，计有《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书谱注释》和《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真行草书集》、《沙孟海遗墨》、《沙孟海书学院珍藏沙孟海书法作品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篆刻集》、《沙孟海印谱》等，并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两册和《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清代书法卷》等。今人又选编出版了《沙孟海翰墨生涯》、《九如集·祝贺沙孟海九十寿》、《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卷》、《沙孟海百印选》、《沙孟海论艺》等。生平研究资料，主要见《翰墨春秋·沙孟海纪念文集》、《沙孟海年谱》等。

承蒙国家重视和各方面的关怀支持，《沙孟海全集》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西泠印社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本着『立意要高，搜罗要富，反映要全，出版要精』的编纂方针，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历时三年，全集凡七卷十二册终于杀青刊行，其预立不睨，信可慰也。

全集规模，以类编次，厘订如下：

一、《书法卷》三册。共计遴选收录沙孟海历年来具有较高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三百余件，以文博单位的收藏为主体，辅以公开征集的私家藏品，旨在全面反映各个年龄阶段探索、发展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广大读者呈献一份权威且丰富的学习范本与研究资料。

二、《篆刻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治印大致在六百方左右，传世印迹约有五百余方，所篆所镌，在少在精。本卷所收，力求完备可信，有根有据。虽然其传世印章有半数以上完成于三十岁以前，好在其风格面貌成熟也早，卓然不为时贤所掩，颇好辨识，取舍不难。

三、《书学卷》一册。沙孟海的书学研究，主要以论文、著作、序跋、讲跋、讲话等形式公开发表，其他如书信、日记之类也见涉及。为便于读者检阅，本卷按诸篇体例与内容，厘为自述、论文、序跋、著作、其他（讲话、书信等）、附录（日记摘录）等六类，各类又按完成篇章的时序编次。如此，沙孟海从事书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所关注的学术重点，庶可明晰。

四、《印学卷》一册。此卷编次，与《书学卷》大抵相近。沙孟海一生的印学研究有三十余万言，其研究一如书学，史论相兼，

不失精审。长篇专论之外，多有序跋，或边款，虽短章小文，并见用心，细言大义，学识在焉，盖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之文献。

五、《文稿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所作的文学辞章和学术研究之著述，凡日记、书信、书学、印学诸卷已收之外，另有学术性较强，或可圈可点者，皆入此卷。按体例与内容分类编次，曰联语与诗词，曰考古与文物，曰中国古器物学，曰语言文字学，曰发言稿，曰行状碑记，曰回忆录，曰其他。其中部分篇章本之未刊手稿整理，为首次面世者。沙孟海多方面的学术造诣，更可于此得窥一斑。

六、《书信卷》一册。从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历史性等角度出发，在搜集到的六百多通书信中，精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二百多通，一一加之释读，分为：（一）凡收信人可考者，按年辈编次；（二）收信人未详者，按照大致年代编次备考；（三）以个人或组织名义起草，发往单位的信件或公函。以上三类，涉及一百多位（家）个人和单位，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多年，有助于读者了解沙孟海的平生交游及其书札文采。

七、《日记卷》四册。沙孟海早年已有日记习惯，《僧孚日记》、《兰沙馆日记》即是。在其家属的支持与亲为下，本卷将存世的手稿影印出版，公布于众。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家属的意见，部分日记作了些许技术处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与艺术，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贡献与作为。但凡在某一领域导引风气之先，且又能集大成者，是为时代人物。值此纪念沙孟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得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倾力编纂出版《沙孟海全集》，旨在整理文献，全面反映沙孟海学术、艺术成果，不仅有利于沙孟海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反视，而且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建设浙江『文化大省』，莫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二〇一〇年八月谨记于杭州思微室

本卷导读 / 戴家妙

沙孟海在《沙邨印话》（以下简称《印话》）中自述：『余治印受之庭训。』另据《沙孟海先生年谱》载：七岁时，『课余回家后由父亲隔数日教一二个篆文』。九岁时，『见父亲将自镌「活人命于纸上」六字朱文印钐于为人诊病之药方上，深感兴趣』。十一岁时，『识篆文颇多，常取小印石刻印章』。十二岁时，能认读报载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文字，『师生为之惊异』。这是目前他总角时对篆书、篆刻感兴趣的最早记录。

沙孟海治印一开始效仿赵叔孺，《印话》中记：『余治印初师叔老。』据留存的早期印蜕来看，一九一七年前刻有『孟海』、『定国后裔』二朱文印，一九一七年刻有『沙文翰印』一白文印，均为自用印。其中『孟海』朱文规模小玺、『沙文翰印』追踪汉制，可以推想他学印起步时，谨严规矩，平实为上，而『定国后裔』一印则明显有赵叔孺的风格。

沙孟海第一次拜谒赵叔孺，在《僧孚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二日有记：『与夷父（葛暘）过访叔孺先生，公阜（吴泽）亦至。』时赵叔孺回甬上，沙孟海由其师冯君木介绍前往拜访。赵叔孺在辛亥革命后就移居沪上，时回家乡，每次都匆匆往返，沙曾几次往访未果。《日记》并记：『先生于余篆刻极加赞许，不惟于余前言之如此，每遇相识，亦常称许，知其非泛泛视我也。师（冯君木）尝语余：学问之道，途径至博，孰正孰辟，岂易区别。弃舍从由，全在际遇。汝之学诗文而遇我，学刻印而得叔孺，皆主张公允，不为偏怪欺人之论，皆所谓不期而遇者，此其中实有幸焉。』^①《印话》中还记：『余初谒叔孺丈于上海虹口，丈以歙黄朴存先生（质）《滨虹草堂藏印》一部相诒。』与《日记》所记初谒地点有出入，大概是追忆时有误。

其实，在拜访赵叔孺之前，沙孟海对赵氏的篆刻艺术已有较深的钻研。如《日记》一九二二年七月中记：『余初作秦汉印，漠

然不得其趣，并不知何处著刀。后见赵叔孺、马叔平（衡）诸人仿古之作，模拟再三，始有人处。赵仿秦印尤精雅不苟，秦印本粗疏自然，但若从粗疏处着手，便只得粗疏二字，无复有其神气。赵独以挺健精致之刀出之，此犹守桐城家法以学《史记》，故所就益工，无明人外强中干之病。余所作白文「钱罕」、「道用」、「顿丘」诸小印，皆由赵法进窥嬴氏者也。」

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沙孟海离甬抵沪。之前，他治印兴趣非常高涨，常常竟日刻印。同时，他也感到刻印多，耽误学习诗文时间，心里非常矛盾。「书画篆刻之艺，足以资助文章，实适以妨碍文章也。余粗解作书刻印，每为人作，则费半日或全日不能读书。盖未作之先，书须研墨，即非自研，既有兴于此，断不能作别事。印则谱籍盈几，苦思力索，益费功夫。既作之后，书则洗笔与砚，收检纸墨及用印章，何多事也。印则腕力既疲，心神亦颠倒矣。于相师（张原炜）尝谓余于画性亦与近，宜并习之。余才习二事，已足夺我学文时间。若更学画，是将终身为技艺之人矣。」^②「因念此身为接客刻印二事所羁縻，消磨精神，荒落学业，莫斯为甚，愤慨之极。欲榜诸门不见一客，并焚毁刻印之工具，闭户静处。」^③「使我学业无成者，必是物也。」^④很明显，青年时代的沙孟海的奋斗目标就是「经邦济世」，不欲以技艺而终，这也是无数民族精英的人生终极理想。

抵沪后不久，于十月廿五日在张让三的引荐下，由朱复戡陪同去海上书画金石题襟馆拜访吴昌硕，第一次未遇，只碰到俞语霜。^⑤十二月三日，再次拜谒吴昌硕于上海山西北路吉庆里。^⑥这次拜谒「略复接谈，未及所刻而就正」。一年后，由于况蕙风激赏他的印作，进而向吴缶翁推荐，获题辞：「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况氏晚年与浙籍金石家交往密切，认为沙孟海的篆刻有「静、润、韵」三字之妙，后又增为五字：「劲、润、韵、静、靛。」《餐樱庖漫笔》中记：「甲子冬日，与慈溪朱君炎复结邻。因介绍获交其同县冯君君木，声气之雅，倾盖如故。飘灯隔巷，风雪过从，良用慰藉。……其高弟子沙孟海，诗古文辞，能绍述师法，尤工刻印，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于近世印人，神似陈秋堂；篆法尤极研究，无孱杂迁就之失。缶翁绝契赏之，谓后来之秀，罕其伦比。」吴题：「蕙风绝赏会之」，况记：「缶翁绝契赏之」，可知二老对沙孟海的厚爱。

自此之后，沙孟海经常跟随吴、况二老出席一些社交活动^⑧，得以拜识朱孝臧、康有为、郑孝胥等遗老，眼界益阔，艺事大进。赴沪之前，沙孟海的印作明显受「二赵」（赵之谦、赵叔孺）的影响，尤其是前者。《目录》中常记有：「自刻绝类赵悲盦」^⑨，「本意欲拟拗叔，刻成乃尽文何」^⑩，「用拗叔为沈郑斋之法缩而细之」^⑪，「仿拗叔白文，颇有浑厚之致」^⑫，「略用拗叔模古币文法」^⑬，「朱文小印绝精，自谓尽悲盦所能矣」^⑭等语。但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之后，无论《目录》还是所刻印章边款中，很少提及模仿赵之谦，较多出现的是仿效「宋元印章」、「文何」、「汉印」、「浙派」、「邓完白」、「六朝古体」、「秦印」、「拟古匋器」、「鼎卜文」等语。他在

另一段《目录》中记：『邓完白刻印，篆法益诡伪无稽，其旁款多用隶书，操刀无迹，朴茂之至，真旷绝一代，枊叔不若也。』尤其在乙丑夏日即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间，连续出现『类吴让之』、『学让翁』、『用吴让翁笔意，自谓工稳之至』等语。这一转变与吴昌硕的交往有着重要关系。一九二五年四月十日，沙孟海『以近刻印存就正缶翁先生，翁为题卷端云：浙人不学赵枊叔，偏师独出殊英雄。文何陋习一荡涤，不似之似传让翁。我思投笔一鏖战，笳鼓不竞还藏锋』。他后来追忆此事时亦称：『玩其语意，知此老论印不与枊叔，意欲余改乘轅而北倾向让之。让翁神韵故当胜于枊叔，而枊叔平实雅秀，功力有余，学者取径于此，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刻印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此则觔生之志也。』《印话》中亦记：『早岁治印，喜为枊叔。乙丑四月，缶庐丈题余印存，乃云：『浙人不学赵枊叔』，又云：『不似之似传让翁』，盖讽之转旆也。缶老亟称让之，然其集中为让之体者亦复不多。通观全稿，浑刚苍古之气，不可鄙视。让之对之，故当却步。余近作亦不肯专为谁体，老杜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吾意亦犹是耳。』这几段文字，足可以看出沙孟海始终抱着转益多师，兼采众长，不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精神。

在吴昌硕的指导下，沙孟海治印由原先的取法『二赵』转向以汉印为主，兼及邓石如与吴让之，济以浙派诸贤，其中对浙派篆刻认识的前后变化耐人寻味。《目录》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余论印最不与浙派，有意雕琢，望若钝朴，实非古法也。』到了上海接触吴缶翁等诸前辈后，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目录》一九二三年九月六日中记：『余往日论印不与浙派，近乃认浙派为学印之正路。本明人之挺劲出之以朴老，名家若赵枊叔、吴缶翁早岁皆从此出。』这两则日记反映了他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以及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他刻印也一改之前的秀整之风，变得苍浑遒劲，圆转厚重，不似某体又似某体，格局益见恢弘。可证缶翁乙丑题辞对他的触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教导，终身受用。

一九二八年春，沙孟海告别教授生徒、治印鬻书的生活，离开上海，至浙江省政府秘书处任职。之后的数十年间，随着政局变化，沙孟海转移于广州、南京、重庆之间，漂泊之日多，安定之日少。加之海上诸老前辈先后下世，治印问艺的雅兴退却了许多，虽也时常为友朋同僚操刀治印，但主要精力已经转向公务，步入谋取生存与学术研究共进的新阶段。

一九二八年，沙孟海撰成两文：《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一九三〇年第廿七卷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他开始《印学史》的撰述。该书虽迟至一九八七年才出版，但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意义非凡，奠定了沙孟海在现代印学史上的关键地位。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

解放后，沙孟海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经历多次运动，曲折坎坷，但都以智慧来面对，坚持学术研究。偶有治

印，亦是自用为多。六十年代，因西泠印社恢复活动，重新燃起篆刻的热忱与撰述的计划。由于年事渐高，刻印数量远不及过去了。但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达到其一生治印的最高峰。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西泠印社七十五周年社员大会上，八十高龄的沙孟海被选为第四任西泠印社社长，将他推向印学巅峰和印坛领袖地位。众望所归，这是他一生身经乱离，坚定执著于学术与艺术的结晶。

二

沙孟海在《兰沙馆印式自记》中称：『平昔不恒治印，留稿亦仅，虽复自有胸怀，而才短手蒙，所就殆无全称。』^⑮幸好他素有日记习惯，平时治印基本有记录，这为研究整理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他生前自己编集的印谱有《石荒生印存》^⑯、《兰沙馆印存》、《兰沙馆印式》三部，其中《石荒生印存》是集辛酉（一九二一）七月之前所刻印为一册。曾留在学生蔡绰如处，乙丑九月十一日归还，后不见下落。《兰沙馆印存》起己未（一九一九）迄癸亥（一九二三），凡六册，计录一百六十八印。此印存后亦不见下落。《兰沙馆印式》是一九七六年三月所集，分为两编：初编起甲子（一九二四）迄甲戌（一九三四）十一年间所作二十八方，续编起癸亥（一九二三）迄甲辰（一九六四年）四十二年所作五十三方。该印式于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其中印作均编入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沙孟海篆刻集》^⑰，该集为目前最为齐备的集子。他生前自己手订的印谱仅这一部《兰沙馆印式》，少作汰除较多，说明他后期的印学眼光较之青年时代有着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其余如《娑罗集》是他早年与屠润规、屠洵规、谢道用、冯宾符以及沙文求等五人的印作一起首次成集，约三十许钮。惜无边款，一些印作无从辨认出于谁手，其中大半以上是沙孟海的作品。二〇〇〇年五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沙孟海印谱》钤印本与《沙孟海百印选》两书，里面有几方印作之前未曾露面。

以目前能见到的印蜕来计，存世篆刻作品约五百二十八方。据《目录》所记还有约二百一十五方印散失，合计沙孟海一生治印总数约在七百五十方。其中留存的印作作于沪上期间约有二百九十来方，占其总数近半，可谓创作旺盛期。

究其原因，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商埠，经济、人口迅速增长。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南迁，大批官僚以及没落贵族纷纷南下，蛰居海上，形成了巨大的收藏市场。即使抗战期间，因为租界原因，上海的艺术市场还是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当时上海两个最大的金石书画团体：海上金石书画题襟馆和豫园书画善会，即分别由盛宣怀、王一亭出资建立，会员均为著名书画家及达人名士。沙孟海虽是应宁波富

商屠、蔡两家之邀抵沪，担任家教，谋取衣食，但其初衷还是与上海当时的社会氛围有着密切关系。初来乍到，立足谈何容易！他在给好友朱赞卿刻『鼎煦』一印边款中记道：『壬戌十月，薄游沪上，离群索居，萧槭寡欢。』后来，在修能学社任课期间，因张让三、冯君木等诸老前辈的力举，声名渐起，开始订润鬻字卖印，但内心志业还是在文章上。所以，他说：『治印十年得为诸老辈所赏识，不负初心，固属幸事。然于学问文章一无可恃，徒以雕虫小技见知长者，充其极，不过周栎园笔底驱遣人物耳，岂私心之所愿哉？念此转自愧慙，藏身戢迹，更不欲与诸公相见矣。』因此，在考察他的篆刻受主时，大多为师友、学生以及书画界中人，最多的是为葛暘所刻，《目录》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一日记：『余夙昔为夷父刻印最多，计此印为第三十三钮矣。』余者如冯君木、况蕙风、蔡宛颀、童第德、陈逸、朱赞卿、双止澂等，都有十数方。王遽常在《沙孟海论文集序》中说：沙孟海『于情义、于国、于亲、于师、于友，皆恳款出肺腑，所作每流露于不自觉。』¹⁸知己之言，可为确评。

沙孟海一生治印可分为四个阶段：自少年时代喜欢刻印至一九二二年离甬赴沪之前，为起步阶段；一九二二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春离沪赴杭之前，为篆刻生涯中之精进时期，取法日广，转益多师，面目渐成；一九二八年至解放前夕，游幕与治学相兼，虽有漂转四方的艰辛，但其篆刻之艺则入成熟时期；解放后至六十年代前后，谋事沉浮，境遇起伏，但人印俱老，渐入辉煌时期。晚年，除偶尔应酬友朋之外，不多治印了。

沙孟海治印最多的是一九二五年，刻了近一百五十方印章。其次，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间，他沉迷于刻印，常一日连成四五印。再就是一九二八年。这一年他离沪赴杭，暂时的安定使得他燃起刻印的热情。同时，潜心学术而不必栖栖于谋食之途的心境，也大大拓宽了他治印的广度与深度，一些代表作应时而生。

另据统计，沙孟海自用印约五十五方，其余是为两百余位师友、学生及亲属所作，可考者约有一百六十余位。其中，老师辈有冯君木、况蕙风、赵叔孺、朱孝臧、钱罕、张原炜、陈训正、洪曰湄、杨菊庭、冒鹤亭、杨敏曾、杨鲁曾、姚贞伯等人，其中除况、朱、冒、章外，基本都是慈溪、鄞县耆宿，对他有知遇与指导之恩，是他立足上海滩的重要引路人。

友朋辈有冯定、陈布雷、陈训慈、陈训恕兄弟、葛暘（夷父）、李冰夫妇、俞子怡（次曳）、吴泽、童第德、童第周兄弟、朱炎复、徐公起、易忠策夫妇、蔡守谈月色夫妇、张千里、朱鼎煦、张宗祥、韩登安、潘天寿、沈尹默、夏承焘、潘伯鹰、王个簣、蒋国榜、胡行之、陈星庚、陈彰、胡吉宣、况维琦、况维琚兄妹、秦康祥等，基本都是他治学道路上的知己。

学生辈有宁波富商蔡明存的八个子女：蔡炯（衣云）、蔡紘（道依）、蔡紆（柔宜）、蔡约（绰如）、蔡芳伊（维絮）、蔡绛（赤

华)、蔡宾牟、蔡安安;屠用锡(康侯)的两个儿子:屠润规(伯系)、屠洵规(即屠果,字武仲);冯君木次子冯宾符,以及谢道用、陈逸(修良)、诸驯(孟察)、孙碧依、孙锦纤、陈玲娟(陈布雷九妹)、胡季孺等人。谢道用、陈逸、蔡纤、蔡约、蔡芳伊、蔡绛、蔡宾牟、屠果以及诸驯曾师从沙孟海治印,《目录》记录多条由沙孟海篆稿,诸弟子刻制,再由他改削的文字。屠氏昆仲、蔡氏兄妹、冯宾符以及谢道用等,一九二二年暑期都曾从沙孟海读书,课余治印,集有《娑罗集》,此亦甬上印坛之雅事。

为当时海上名士治印的有:傅宜耘(安心头陀)、张纲伯、李石岑、张珠庭、杨瑛(原名吴茵)、颜任光、张琴南、程振钧、金绍基、周信芳、余岩(云岫)、贺师章、钱鸿范、朱枫、周利川等,他们中有名演员、名医、高僧,也有革命烈士、物理学家、水利专家,大多为宁波同乡,可窥民国时期宁波文风昌盛以及宁波名士在上海的影响力。

为当时沪上富商刻的有:王冰生、李徵五、李景韩、秦润卿、张之铭(伯岸)、孙鹤皋、张簪(张簪三兄)等,亦大多是宁波人,其中李景韩、张之铭为著名收藏家。张氏的『古驩室』是浙东名藏书楼,章太炎为其作《古驩室记》。^{①9}张之铭曾不余力求购搜集图籍,从四部、释典道书以至碑版书画,无不收藏。听到有孤本珍板,非收购不可,即使资金欠够,也不惜奔走乞借收购,得中外图书数以万计,在日本东京桥区建书室三楹以度藏,命名『古驩室』。民国十二年,因日本东京地震,藏书皆毁。次年返回上海,继续广收群书。一九五一年,其遗书尚未散。三年后,其家人陆续出售,散失殆尽矣。

为当时海上书画家治印则不多,目前仅见任薰、沈炳儒(沈钧儒弟)、魏友棐、康心远王棣华夫妇以及杨士猷等。

为解放前的同事治印有:王显华、吴东初、吴鸿基等,前两人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后者为教育部的同事。政要有:胡适、周骏彦、杜忱、夏超、丘远雄、陈其采、庄崧甫、翁文灏、朱家骅、顾树森、何辑五、陈方、程镇西、双清、金筱甫等。

为解放后的官员治印有邓拓、田家英及其夫人董边、逢先知、裴润、石山、魏文伯等。其中,田、逢、裴、石等人是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央派到浙江农村调查小组成员。在浙江省博物馆任职期间,还为汪济英、黄涌泉以及张英田张茵夫妇、孙永乐、叶勃新、杜承钧、陈雨笠、邱嗣斌、萧传玖、林乾良等人治过印,数量不多。

一九二七年冬,沙孟海为日本山本悌二郎刻过两方印章:『大司农印』、『澄怀堂主』。山本曾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收藏大量中国书画,编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其中有许多钜制。当他来华时,欲求吴昌硕治印,没想到吴已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逝世。于是,他就分别请赵叔孺、王个簃、沙孟海三人各刻二印。这是目前仅见的为日籍人士所作的印章。沙孟海还为两位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德国将军佛采而、塞克脱各刻过一方印。

其余就是为家人所刻的印章，有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史永）、沙文度、夫人包贲华、儿子沙更世、女儿沙频之等。

难以查考者有：费瑚卿（广文）、徐行知、伍井、杨荣邻、张如相、弢士、冰壶、君肃、夏襄寿、汤说卿、杨荣士、沈安廉、骆纬景、吕律、钱君卿、树壁、蒋国猷、湛霞、佛生、蒋丙华、墨冉、引毅、江圣一、九刺散人、寥阳、弢父、奇湘、汪浩、孙如海、张锦、橐斋、印高、仲晦、邱里虹、罗得民、汤闇、魏敦厚、王文达、王黎、崇文等，望知者赐教。

三

沙孟海一生治印少而精，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兼具金石味与书卷气，格局大，意境深，迥于时流。在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都主张『创新与崇品』^②兼及，欲能继承前哲的大道正途，聚沙积薪，示来者以规则正鹄。他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盲目崇洋媚外；强调『以己之性情，合古人之神理』^①，主张要兼师众长，不拘樊篱，融『阳刚、阴柔』于一体两派。他的篆刻以秦汉为根基，下涉浙派诸贤及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诸家，运用赵叔孺、吴昌硕两家之『气』，调和浙皖，撷取秦汉神韵，而不斤斤计较于与二师的形似，大方简洁，高致绝伦，傲视群雄，处处见古人，又处处有自我，独立变法，不为师法所囿。他晚年答友人问：『乃所愿，则学钝丁也。』^②他所愿正是西泠领袖丁敬那种『思离群』的嘎嘎独造精神！所作不同凡响，近代印坛，无人能出其右！

自乾嘉以来，印学之道昌明，丁敬、邓石如诸人，筌路蓝缕，为后世印人开启大道。但惜于所见历代印章不及后来者之众多，难免有稍许粗率之作。沙孟海作为后来者，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成就自然更进一步了。尤其在拟刻古玺、秦印、汉白文等样式方面，更多创造，这与他早年就留心古玺印有很大关系，曾说：『古玺这门学问，从清朝季年到民国初年这一阶段才逐渐形成。……我年轻时曾一度心向往之。』^③加之他在金石、考古、文字学上的深厚学养，自然化出，不见矜持。如『千岁忧斋』、『尹默八十后作』、『濮尊朱佛斋』、『赤堇沙氏』、『式抱』、『玄之又玄』、『孟海』等印。

沙孟海对秦印情有独钟，早在二十岁前后就开始拟刻秦印形式的印章了。对于秦印，自明以来，诸印学家均没有明确辨认出具休年代，大家只是朦胧意识到是秦或秦之前的印章。所以，仿刻者亦不多。沙孟海眼光独到，从习见材料中梳理大家不注意的问题，一直关注、研究秦印，并于一九六六年撰成《谈秦印》一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之《艺林副刊》上，是该领域较早的、最为系统的成果。而在他所刻印章中，从早期到晚期有不少是拟秦印风格的，如《目录》中有很多关于秦印的记录，到了晚年更是新境界了，

如『裴润』、『夏承焘』、『手钞六千卷楼』、『秦康祥』、『黄涌泉』等印章。

晚清，诸印家对汉印的理解与取径各不相同，尤其吴昌硕之后，超越皖浙，创造了新的境界。沙孟海没有以形式上的新为新，而是在汉印规矩的体制内，朝着至高的艺术境界而努力。另辟蹊径，后来者居上。他所作汉印样式的印章如『回风亭』、『审曲面势』、『韩竞私印』、『张宗祥印章』、『容平私印』、『沙文若』、『传玖画记』等，浑穆淳朴之中跃跃有生气，更见刀味，此正所谓金石气也，一如其书之雄强气势，摄人心魄。

沙孟海所作朱文有近汉朱文，如『蔡紆印信』、『秦润卿』、『徐可燦』、『庚午』等；有近『二赵』者，如『蔡氏四女』、『丽娃乡循吏祠奉祀生』、『张原炜印』、『大司农印』、『好丽楼』、『鄮卿心赏』、『臣书刷字』等，皆蕴藉精到，沉静有趣，别开生面。

同时，沙孟海还尝试探索其他各种体裁印作，如吸收陶文、刀币文字、碑版书以及楷书、隶书等文字样式入印，广泛涉猎，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胆略与创新精神。如拟陶文的有：『诸』、『下笔已到乌丝栏』；楷书入印的有：『临危不惧』；隶书入印的有：『冷僧墨戏』等。

沙孟海为艺治学都深受其业师冯开的影响。一九一四年，他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便拜冯氏为师，学习诗文。《冯君木先生行状》中称：『先生于学，无术不综，广稽约守，包括道要，不为门户异同之论。文章渊雅，尚规汉魏，言典致博，造次必尔。盖自文笔别涂，不相合谋，骋辞华者，日靡于繁富；矜省净者，拜遗其风骨。先生假长补短，独重气体，剥散浮华，归于简朗。用能巧不伤理，隼不害道，安帖牢固，情彩并茂，可谓修辞立诚，文质彬彬者也。诗主萧澹，不涉凡响，蘄向所屈，惟在介父（介甫）、无己（师道）。故其所为，植骨必坚，造意必刻，运息必微，导声必涩，哀然自成一家言焉。』加之，当时甬上诸前辈如赵时桐、张美翊、张原炜、陈天婴、姚贞伯等皆是清雅之士，持论公允。所以，沙孟海于学、于书、于印，也皆从公允处出之，不作偏怪欺人之论。

沙孟海在《目录》与《沙邨印话》中数次提到篆刻师法赵之谦的『平正雅秀』，『可以无弊，犹之文章之桐城派也』^②，此话道出他为艺治学的关键。他把印章分为『阳刚阴柔』两派，『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皆本源于桐城派。桐城派论文强调『阳刚阴柔』的文学审美观之分，移于印学，称：『此四象（指太阳、太阴、少阳、少阴）者，各有攸长。若必执其一，以揆其余而强为出入焉，斯惑矣。』^③有人问他：『近世印人截然两派，或主气魄，或尚韵味，荆玉灵珠，各自珍爱，将孰为是非乎？』回答是：『此吾恒言阴阳刚柔之说也。微特刻印然，凡百艺事，禀受天性，莫不尽然。龙门、扶风，文异体也。渊明、康乐，诗异格也。稼轩、白石，词异调也。率更、鲁公，书异迹也。大李、摩诘，画异宗也。大氏庙堂之上，多得工能之美；山林之间，咸逞放逸之才。验